

每個人活在世上，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社會生活中，或是明星，或是政要，或是平民百姓，或是這種那種公衆人物；在家庭生活中，或爲人父（母），或爲人子（女），或爲人夫（妻），或爲人兄（弟），又有各種不同的身份。把公衆人物的私人生活當作娛樂八卦津津樂道，大多出於好奇好玩，沒有多大的意思。《宋史·王旦傳》有不少文字，記載宋真宗時宰相王旦居家過日子的私事及家庭瑣事，卻能使人見其「修身齊家」之一斑，別有一番感受。對於立體認識王旦，不無補益；對於今之治國理政，也堪爲鏡鑒。

堂一國之相，家有綾羅綢緞珍奇古玩不足爲奇，王旦不然。他用的被褥穿的衣服布料都很一般，家人想用「綢緞」（有彩色花紋之絲綢）爲其鋪繡「氈席」，未曾得到他的許可。他的弟弟看中了一條玉帶，感到很漂亮，專門買了送給他，他讓他弟弟繫在自己身上，問道：「還漂亮嗎？」弟弟回答說：「我自己怎麼看得見呢？」王旦說：「只是使別人見了稱好，徒然加重自己身上的負擔，戴了幹嗎呢！」他沒有接受弟弟的好意，依然佩朝廷所賜之帶。王旦也「不置田宅」，住的只是先人留下的舊廬。如此這般，亦可見其「薦賢而不市恩」之真實性。王旦去世之後，人們方知「朝士多且所薦」，倘若他「薦賢市恩」以至於賣官鬻爵，以官銜大小論價，還能清貧如此嗎？

宰相之家可謂名門大族，並非「三口之家」可比，上下左右的關係都得理順。朝夕相處，天長日久，難免有磕磕碰碰的事令人不快。人在官場，身不由己，但將家庭作爲避風港，懶居之事，回家發泄，也情由可原。王旦能做到「家人未嘗見其怒」，即使「飲食不精潔，但不食而已」，實爲不易。家裡的人測試過他「制怒」的底線：「嘗試以少埃墨投羹中，且惟啖飯，問何不啜羹，則曰：『我偶不喜肉。』」後又墨其飯，則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別具粥。」如此克己待人，連一般的人都很難做到。至於「且事寡嫂有禮，與弟友愛甚篤。婚姻不求門閥」，也是在宗親關係中待人寬厚的一種表現。他的這種格調，與他在朝堂之上同僚之間嚴於律己寬厚待人的大度兼容正相一致。

王旦家風純正，沒有瞞上欺下口是心非貪圖安逸揮金如土的陋習。他之所以「不置田宅」，乃是爲了使子孫自立自強而不因財忘義，所謂「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爭財爲不義爾」。他在臨終之時仍不忘告誡子弟：「我家盛名清德，當務儉素，保守門庭，不得事於泰侈，勿爲厚葬以金寶置板中。」尤其是他一生的言行，更是讓子孫信服的家教以及留給子孫的精神遺產。他的三個兒子王雍，王冲，王素個個成才，與他的言傳身教不無關聯。尤其是季子王素，在「西邊」當地方官「多惠政」，日後「再爲渭州，邊民老幼，至相率稱賀」；在朝堂爲台諫，剛正不阿，以至直言諫「色」，讓宋仁宗忍痛割「愛」，「立命遺二女出」，與蔡襄、余靖被史官並稱爲「昭陵賢御史」。

如果在三十年前，我或許會對史書所載的這些事心有疑竇，以爲這種「爲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的『正史』」不足爲據。如今卻以爲史書所載雖然不可全信卻也不可不信。就以《宋史》的「列傳」而言，同爲「帝王將相」的，該鞭笞的照樣鞭笞。同是王旦，也不忌諱或掩飾其過，例如他的「不諫『天書』之失」。

對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句話，以往也沒有多大的興趣，只把它當作儒家的一種教條。因爲有太多的事實使人感到，這句常被官場中人掛在嘴邊的話，只是他們進入官場的敲門磚，混跡於官場的附身符。然而，王旦的私事與家庭瑣事，卻能讓人看到修身齊家與治國理政之關係的清晰脈絡。

首先是「修身」：所謂「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不僅治國理政，想樹立一種好的家風，也用得上這句話。

其次是「齊家」：所謂「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以爲「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屋」的，未免有些虛妄。

緣分

許育紅

奶奶不識字，但能言善語、家教嚴嚴。如，奶奶常教育我：「在戶仔」要正襟端坐；飯碗裡不可有殘渣，否則，成人後會變成「麻子」臉。奶奶最疼愛我，因爲在家中我是長孫女；奶奶送了個「半番」的暱稱給我，因爲我耐勞、憨直、開朗。奶奶還誇我「乖」，說我長大後可以嫁「番客」。閩南話中的「番客」，是指從中國內地到境外謀生的華僑（指定居國外的中國籍人）、華人（指具有中國血統的外國籍人）以及港、澳、台同胞的總稱。當然，奶奶相信：凡事皆靠緣分。

其實，當代閩南語中的「番客」，與中國福建泉州歷史上「番客」所指的對象不同。

唐宋時期，「番客」是指在廣州、泉州等通商口岸經營的海外諸國客商及其家屬的總稱。「番客」聚居的區域稱作「番坊、番巷、番市或番落」，一般歸所在地的市舶司管轄。番坊的設置，不僅有利於海外諸國「番客」來華進行貿易和中外使節來往，也便於「番客」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生活習慣以及撫養子女等。如：「番客」中多數來自大食諸國（指阿拉伯國家），其番坊所在地可興建清真寺；爲使「番客」子弟能夠就近上學，宋廷在廣州、泉州等地設立番學（指學校）。番坊設有管理「番客」的番長司，推選有聲望又富有的「番客」爲「番長」，負責管理番坊貿易、宗教、生活以及招邀「番客」進貢朝廷。這種「番長制」，歷史學家稱之爲「中國領事制度的萌芽」。這也許是泉州成爲目前世界公認的中國海上絲綢之路起點的原因之一。

贊述從簡，言歸正傳。大學畢業後，我被分配到外交部領事司工作。由此，奶奶對爸爸、媽媽說，你們的「乖」女兒、我的「半番」孫女算是送給政府了。從此，奶奶再沒提及「番客」之事，只要求我千萬別嫁給「阿北仔」（指北方人），因爲奶奶聽不懂普通話。

在北京工作兩年後，我被派往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工作。其間，我遇到了我的另一半。他人很好，可他偏偏就是個地地道道的「阿北仔」。

在東京工作的日子裡，我們認識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華僑老奶奶。有一天，老奶奶請我們到她家中做客。豐盛的晚餐之後，老奶奶送我們一件禮物：一個用黑色棉布做成的錢包，上面繡着一朵紅色的「中國結」，裡面放着一枚金銅色的日本硬幣「五元」。望着我迷惑不解的表情，老奶奶解釋道：「中國結」是她親手縫製的；在日文中，「五元」與「緣分」的平假名寫法一樣都是「ごえん」，發音一樣都是「goen」。接着，老奶奶深情地說：「這是我們的緣分，也是我們與中國永恆不變的緣分。」

我收下了老奶奶的禮物，帶回了這位「番客」的「中國結」，心中永遠珍藏着無價的緣分。

黑人女傭故事

進

范沃默（Katherine van Wormer）、傑克遜（David W. Jackson III）和蘇達斯（Charletta Sudduth）採訪了二十世紀中期參與過黑人大遷徙（The Great Migration）的黑人女傭，將她們的故事和南方白人對同一時期的回憶相對照，寫成了《女傭故事》（The Maid Narratives）。

黑人女傭的故事描述了白人的欺壓：她們每次只能從後門進出，要在門邊清洗乾淨才能進屋；不能用主人的衛生間，必須回自己家上廁所；要稱呼主人四五歲的孩子小姐、先生；主人有客人來，她們被警告呆在地下室不要露面；白做沒有報酬，只能拿到一點剩飯剩菜等。同時，她們又熟知主人生活的私密細節，給白人接生、當白人孩子的奶奶，爲白人家庭做飯、洗衣、清掃。有時候她們能和白人婦女建立某種友誼，比如互相交換菜園裡的蔬菜、果子。她們之所以堅忍不拔，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這樣一種自衛機制：她們私下覺得自己比白種主人更有道德。

在白人婦女的回憶中，黑人女傭能幹、可靠，她們和黑人保姆非常親近，甚至稱她們爲「第二個母親」。她們記得女傭在廚房裡特地爲她們準備的三文治（sandwich）和白人女傭並不一樣，那裏的女傭並不接納白人女傭。但無論對自家女傭多麼滿意，她們對其他黑人，包括女傭的丈夫或家人都頗有微辭。

兩廂對照，雖然白人常稱黑人女傭爲「家人」，黑人女傭卻不接受這樣的定位——打掃廁所、洗衣服、做飯，每周拿工資，從不和白人一樣對待，但在困境、危機時刻，女主人又常把她們視爲支柱，尋求她們的幫助。女傭和女主人同樣身處父權制度下，在政治、經濟上都無權無勢；但在種族隔離制度下，她們又在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遭受折磨。

域外漫筆

言簡旨深，他對自己的學術研究充滿自信，對他人的觀點則採取兼容態度。與會者報以熱烈的掌聲。接着，陳校長就緩步走到人群中去，同人們進行親切交談。給人以人淡如菊的印象。

這次見到陳校長，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啓迪，並且潤物細無聲地影響着今後的人生。此後，他的形象、儀態、氣質和人格力量，一直銘刻在我的心上，成爲我精神園地裏一株高大的常青喬木。

鍾情於復旦大學

陳校長善於從一名熱血青年、早期黨員活動家轉換成一位踏踏實實研究學問，並且取得卓越成就的學術泰斗，畢生從事文化教育工作，作出了寶貴的貢獻。解放後，他擔任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上海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主席、上海語文學會會長、《辭海》編輯委員會主任。他深入研究哲學社會科學，倡導語文改革，在語法學、修辭學方面貢獻尤大，所著《修辭學發凡》被譽爲中國現代科學修辭學的奠基之作。

陳校長尤其鍾情於教育事業，擔任復旦大學校長從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七七年，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長達四分之一世紀，這在全國高校的校長中是罕見的。實際上一九四九年八月他就是復旦校務委員會主要負責人。據說，是毛澤東主席親自任命他爲復旦大學校長。復旦大學校名四個字展現了遒勁雋秀的毛體風骨。陳校長爲復旦傾注了晚年的全部心血，復旦深蘊着他的理念和風格。復旦校風向以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而著稱。當年我在復旦唸書時，師生們常以陳校長引爲自勉，常以復旦的校風砥礪自己。人們讚揚陳校長寬容大度，豁達謙和，學問博大精深。

一九五二年復旦院系調整時，陳校長夙願若渴。他親自到火車站將一些名教授接到復旦來。當年，復旦雲集了一大批全國大牌教授和著名學者。如：數學界巨擘蘇步青教授，不僅學術成就卓著，而且積極靠近共產黨。一九七七年後，他衆望所歸，接任陳校長擔任復旦校長。生物系談家楨教授在傳學方面獨領風騷，相傳毛澤東與他情甚篤，曾多次與他在灘地閒談。歷史系的周谷城、周予同教授在史學界英名顯赫，周谷城關於「時代精神匯合論」曾震響史學和哲學界。譚其驥教授開創了歷史地理新學科，名噪學術界。當年復旦還重視培育後輩，湧現出一批傑出的青年學者，如數學系谷超豪、物理系楊福家、歷史系金沖及和中文系蔣孔陽，等等，均已嶄露頭角，後來成爲海內外知名學者。

陳校長特別重視加強學校的教學和科學研究的領導。他認爲一個學校不發展科學研究，教學就上不去，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人才就會成爲空話。建國初期，他即在校務委員會上號召教師積極從事科學研究：「我們一定要爲中國共產黨爭氣，要對文化有所創造，不能把別人的東西翻來覆去地講，教師一定要從事科學研究，要進行創造性勞動，否則文化事業就不能發展，教育事業也不能發展。」從一九五四年開始，每年校慶節舉辦科學報告會。陳望道的一生是勇往直前獻身革命的一生，也是在學術上不斷追求、不斷創新的生。一九七七年他在病榻上完成了他最後一部著作《文法簡論》的定稿工作。

陳校長愛校如家的精神十分感人。一九六五年復旦成立六十周年，準備將國權路窄小的校門移至邯鄲路校門，當時有關部門只撥款一萬元，陳校長感到實難敷用，就慷慨解囊，從自己的積蓄中拿出一萬元補上，終於讓我們看到了堂堂正正的大校門。這件事，直到復旦百年校慶前夕，人們才從陳校長的子女那裏得知。大家深爲校長的默默做事、無私奉獻的精神敬佩不已。

(上)

陳望道在復旦

陸苗耕

陳校長的大家風範

一九六〇年夏天，我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系。到校後，滿耳聽到人們高度頌揚老校長陳望道高望重，學術地位如高山一樣聳立於海上，特別是二十世紀初，他僅二十多歲，率先將紅色經典《共產黨宣言》譯成中文，讓馬恩聖火在中國大地上閃亮，產生廣泛影響。周恩來曾回憶說，青年時期在天津時，閱讀了《共產黨宣言》中譯本等書籍。他還向陳望道意味深長而風趣地說，「我們都是你教育出來的」。毛澤東在一九三六年向外國朋友回顧自己的思想轉變情況時說，有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記在我的心中，使我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他直言指出其中一本書是：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



大學畢業合影，第二排中為陳望道，作者爲第四排右八

(資料圖片)

主義的書。歷史將永遠記住陳校長翻譯馬恩著作的首創之舉。師生們對他敬仰不已。但大家普遍吐露苦衷，不易見到老校長，高年級的有些同學擔心畢業前不一定有機會見上呢！

機運突然降臨我身上，僅僅開學後一個多月，我就榮幸地見到了陳校長，同他零距离接觸。

一個星期六中午，一位青年教師推開虛掩的宿舍房門，親切地說，「新同學，我是陳望道語言研究室的教師，現有兩張老校長學術研討會的入場券，歡迎你們參加！」我喜出望外地接过入場券，並愉快地表示，「太好了，太好了！謝謝，老師！」下午，我約了同室的一位同學一起去。我們兩人首次參加這樣重要的社交活動，心裡泛起甜甜的滋味，換了幾趟車，終於找到了位於市內的科學禮堂，門衛客氣地讓我們兩位遲到者進去。大廳裡已人聲鼎沸，約二百多人，熙熙攘攘，一片熱烈的交談聲。

大學長講話不多，但大家安靜一下，歡迎陳望老講話。會場上頃刻爆發出一陣歡迎的掌聲，接着是寂靜的恭聽氣氛。陳校長帶着濃濃的浙江口音講話。他從容不迫地說，簡直是一個字一個字地往外吐，今天，我非常高興，有這麼多同行前來討論我的《修辭學發凡》一書。我

希望，贊同我書中觀點的同行能不斷增多，並多多宣傳此學說的觀點，還願繼續研究，不斷取得新的成果。對於不贊同我們一派學術觀點的同行們，本着百家爭鳴的方針，希望聽到他們的新見解，這將有益於學術研究的深入發展。陳校長講話不多，但

大學長講話不多，但

大學長講話不多，但